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国家与革命》的时代特色

——兼论《国家与革命》的逻辑力量

周 玉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国家与革命》具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时代特色,其中每一个原理和观点都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因而它能够从历史的逻辑中揭示历史的规律并预见历史的未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不仅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而且为当前批判各种恶毒攻击暴力革命的错误思潮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同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家与革命》;逻辑;历史;逻辑力量

中图分类号:A22/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23-05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具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鲜明时代特色,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强大的逻辑真理力量。它不仅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发挥了直接而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当今及将来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人类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其理论将会继续发挥它那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直到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直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直到人类社会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历史背景: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43}大凡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都源于历史时代面临的巨大矛盾和问题。没有时代危机和矛盾的逼迫和推动,就不会有理论上的重大创造。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显著发展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

这是《国家与革命》的逻辑起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和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2]171}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暴露。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工人的军事监狱。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义愤填膺,迫使他们奋起反对垄断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迅速发展。两股革命运动形势相互辉映、相互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的发展”^{[2]171}。

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权决定一切,国家政权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是革命胜利的最基本标志。但是较长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了修正主义的曲解。伯恩施坦、考茨基竭力宣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具有

* 收稿日期:2009-01-18

作者简介:周玉(1975-),女,苗族,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医学院人文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研究”(09XKS012),项目负责人:周玉。

全民的性质,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一战后,各国机会主义者都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本国政府对外战争,鼓吹各资产阶级国家代表的是本民族利益。于是,机会主义者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结成紧密联盟,一些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代表人物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谢德曼等。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他们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2]172}。这些沙文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找战争的祸首”,都把本国政府的对外战争说成是为了惩治祸首而发动的战争,把对方称为战争的祸首。因此,他们竭力反对摧毁本国资产阶级国家,把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称为无政府主义。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袖都如此。这表明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如果不从理论上摧毁这些机会主义的国家观,“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2]172}。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着手系统地研究国家问题。1916年秋和1917年初,列宁在瑞士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并作了详细摘要,还收集了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关言论,汇集成了一本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蓝皮笔记”,为写《国家与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形成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4月,列宁回到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七月事变,俄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临时政府的一系列表现彻底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与工人为敌的。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形势越来越迫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武装夺取政权已成为紧迫任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艰苦的匿居条件下、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

二、时代特色: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理论的范畴、原理、基本观点、内在逻辑,同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历史逻辑具有多层面性,其最基础的层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第二层面是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过程即实践发展过程;第三个层面是人们对前两个过程思想认识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前两个层面是现实历史的逻辑,那么,第三个层面则是思想历史的逻辑。前者在现实中以感性物质的形式展开,后者则是在思想中以理论逻辑的形式展开。所谓理论逻辑是指理论本身的逻辑关联,即这个理论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基本原则、基本理论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先后叙述顺序及其内在的一种联系。按马克思的话说,是指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1]146},它是历史逻辑在理论形态上的主观反映和逻辑再现,是历史的展现与积存。

列宁曾说,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理论的提出,都不是根据理论的推理,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根据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2]194}。同样,列宁《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考察,也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遵循着实际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而作出结论,非常鲜明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色。

《国家与革命》是一个简称,其全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全书包括初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六章正文和初版跋。正文原本计划写七章,后来只写了六章,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妨碍”了第七章的写作。对于这种“妨碍”,列宁非常幽默地指出“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2]276}从六章正文来看,《国家与革命》的理论逻辑既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革命实践发展过程相统一,也与思想历史的逻辑即理论发展史相统一。

在第一章中,列宁从横向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消亡的基本原理,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175},是“阶级统治的机关”^{[2]176};它同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因而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将会被“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器

陈列在一起”^{[2]182}。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2]188}。这一章虽然是对基本原理的横向辐射，但其理论逻辑的展开，则既与现实历史中国家从起源到灭亡的历史过程一致，也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逻辑路径思想进程的逻辑相统一，同时其理论结论还得到后续几章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革命实践发展过程先后顺序追述的理论印证，从而体现出逻辑和历史的高度统一。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列宁严格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发展过程，以非常鲜明的历史顺序从纵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历史路径和过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过程中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在各个阶段都是一脉相承、不断丰富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产生出一些标志性的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考察，列宁首先考察的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前夜对“国家与革命”的见解。列宁认为马克思当时从社会主义斗争和政治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一定会消亡，其消亡的过渡形式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2]190}。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2]194}在1848年革命前夜，历史还没有提供革命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列宁对法国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写于1848—1851年革命之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考察。他发现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回答了无产阶级国家应该采取何种途径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摧毁”^{[2]194}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因为当时“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2]196}。马克思也“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2]205}。列宁顺次考察了马克思1871年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他发现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的总结，使自己的国家学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列宁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对公社经验分析中最重要的地方，找到了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那就是要用公社这种政治形式，“公社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

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2]219}这就解决了1848年以前、1848—1851年欧洲革命时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接着，列宁又在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的信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论断：“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2]227}。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其产生有其必然的经济基础，其消亡也必定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那么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列宁接着考察了马克思在1875年5月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里，他找到了答案，即“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2]253}。对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2]253}

综上所述，《国家与革命》的理论逻辑，既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先后顺序的考察，又是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历史先后顺序的考察，同时还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发展史逻辑顺序的考察，达到与历史逻辑三个层面的高度统一，从而历史、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论述非常清晰地向读者展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怎样一步步从革命实践的分析总结中来形成、发展和丰富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是在实践中，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

三、历史意义：理论逻辑的力量

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具有辩证的关联。一方面，历史逻辑决定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源于历史逻辑；先有历史逻辑，然后才能有理论逻辑。但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具有能动的作用并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能够把曲折的历史过程加以逻辑的纯化，而且能够根据历史的逻辑揭示历史的规律、预见历史的未来。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论的逻辑往往先于历史的逻辑，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理论逻辑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强大逻辑力量，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的理论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思想家的主观构想，而是源于实践的推动，因而它最终要服务于实践。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完整、最系统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与革命》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观点与原理都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因而它能够从历史的逻辑中预见历史的未来,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先导的作用。

(一)《国家与革命》是缔造社会主义国家的巨著,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

《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歪曲,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部著作不仅直接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他们进行伟大的十月革命,在占世界 1/6 的土地上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在占当时世界人口近 1/4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缔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国家与革命》为当前批判各种恶毒攻击暴力革命的错误思潮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一些人对作为“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暴力革命进行别有用心的否定和攻击。特别是苏东剧变后直到近年来,不少人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对俄国十月革命加以攻击,也有人对中国近现代革命予以否定,主张 21 世纪要“告别革命”。其实质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原理,正确评价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近现代革命,是一个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事关我国能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3]483}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近现代革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列宁曾经说过:“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4]487}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当时都已经具有“成熟了的危机”。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

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32-33}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和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落后反动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两国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5]193},革命因此而成为必然。因此,无论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击,还是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否定,其错误都在于没有认识到革命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

主张 21 世纪“告别革命”也是完全从唯心史观出发的,21 世纪是否革命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由历史条件来决定。因此,《国家与革命》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何况,该著作在号召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时,并没有忽视对和平革命的争取。列宁在引证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时期给库格曼的信中的一段后强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人民革命的结论只限于欧洲大陆,而把英国排除在外,因为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2]202-203}。列宁的这一引证和关注表明,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学者式的冷静和细致,并不因为强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排除和平革命的可能,而是主张根据具体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方法。在实践中,列宁也并未把暴力革命作为最佳或唯一的选择,在十月革命前后,他曾经两次为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而努力,但因遭到俄国资产阶级的拒绝、反抗而未能实现。在当今及今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将来,人类无论是以暴力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都将继续发挥它那不可抗拒的强大逻辑真理力量,直到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直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直到人类社会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三)《国家与革命》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长期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特别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把它作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

卓越最重要的思想”^{[2]190}，“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2]192}他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245}；“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2]246}。“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2]200}；“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199}。“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2]249}。

列宁上述论述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前，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没有必要再讲专政、不要使用“人民民主专政”，就叫人民民主国家。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也是极其有害的。首先，从当今国际形势来看，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未放松对我国的渗透、分化和颠覆活动，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成为敌对势力渗透、分化和颠覆的重点对象。其次，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还将

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有时还会很尖锐。此外，在社会生活中，也还存在着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形势所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不讲专政。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曾反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1480}；“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6]1502}在新时期，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项不低于其他三项。所以，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必须在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对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各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等等，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从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荣军

Conform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the Era Characteristic in *State and Revolution*

—On the Logic Power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ZHOU Yu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era characteristic in the book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logic is highly conformed to the history and each of its principles and ideas are all exact conclusion from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So it can reveal the history law and foresee the history future from the history logic and it has been exerting irresistible logic strength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It not only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provided a strong theoretical weapon for us to criticize the various ideological trends which viciously attack the violent revolution curr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our uphold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tate and Revolution*; logic; history; the power of logic